

翻译研究书系

翻译研究：  
探索与思考

周红民  
著



科学出版社

翻译研究书系

翻译研究：  
探索与思考

周红民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第一章选择了最具代表性的三个经典话语：“信、达、雅”“神似说”“意境”，以当代视角和思维对其予以重新阐释，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在翻译中的延伸和泛化做了解读；第二章选取“翻译、改编和传播”“翻译和翻译体”两个议题，以翻译为“经”，以中国语言文化为“纬”，编织三者相互交织的历史图卷，厘清翻译、改编对文化产生的影响、对汉语演变产生的作用；第三章探讨了中国文艺审美在翻译中的意义，汉语的诗性与汉译中的诗性意识，描述了用汉语意识践行翻译的体验，意在提倡传统审美意识，增强汉语自觉，继承和保卫民族语言的优秀品质；第四章借鉴西方话语对翻译做了精密理性的思考和阐发，选取西方语言学 and 文学研究中的若干命题来拓展翻译研究的空间和视野。

本书适合人文学者、翻译教师、翻译方向研究生阅读，希望能给读者带来深度的启迪和思考。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翻译研究：探索与思考 / 周红民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11  
ISBN 978-7-03-054574-9

I. ①翻… II. ①周… III. ①翻译—研究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4140 号

责任编辑：常春娥 / 责任校对：邹慧卿  
责任印制：张欣秀 / 封面设计：铭轩堂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教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 年 11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B5

2017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5 3/4

字数：295 000

定价：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 前 言

本书探索与翻译相关的问题，对新老问题做不同的看待、不同的阐释和思考。它不讨论翻译技法、翻译策略等本体问题，也力图避免高论、玄思某一理论或流派，对其做经院式梳理、解读和批判。它试图“走出庐山看庐山”，呈现多样的“庐山”、不一样的“庐山”、未曾见过的“庐山”。

本书选择的大部分主题，是一次次历史性呈现和现代性阐释，是在思辨和对话中将之捏碎、重塑和重构的过程。试图在此过程中呈现汉语的美学精神、翻译传统所谓何物，它从何而来，将去向何方，还原“真我”之性情。

在翻译技术高歌猛进、文学翻译日薄西山、传统人文逐渐消解、翻译流派群雄逐鹿的今天，本书捡拾的大部分话题都能给我们带来一种“日暮乡关何处是”“一草一木总关情”的落寞与情愫。

西方的科学话语正在成为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者”。

翻译研究日渐进入科学化、形式化、符号化、逻辑化的轨道。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人文传统、语言传统、翻译话语已变得苍白无力、无所适从，甚至毫无立足之地，它们常常在理论中“失语”、在教材里“失踪”、在论坛上“失声”；相反，西方话语总能披挂“科学”的盔甲，挥舞着“时代”的利剑，高举着“进步”的大旗，所向披靡，无人能敌。它是一切“正义”和“真理”的裁判所，一切或古或今的知识体系都要接受它的检视和审判。在科学思维的主导下，我们的翻译研究面临着形式化的危机，逐渐沦为概念化的游戏。

当然，在全球化语境下，一味地“考古”“复古”“泥古”不是当代学人应有的姿态。

一方面，中国译学面临着既要国际化又要民族化的双重探索——如何用中国经典话语化解西方话语，又如何用当代人的思维去激活、诠释中国经典。这道难题考验着译界学人的智慧和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自尊和自信。中国译学的基本精神，是区别于西方之民族灵魂、民族气质、民族风貌，一旦丢失，就丢失了个性、失去了自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中国的就越具恒久的魅力和生

命力。中国译学经典不是博物馆的古董、古村落、传统手工艺、古生物化石，而是流淌着鲜活血液的生命实体，但它又需要不断补充输入新的血液，来维系和增强生命力。因此，中国传统译学需要当代学人的人文关怀和现代性思考，这样才能激发出更大的活力。这就需要张开中国语言文化之网，让中国的经典话语、翻译精神在建构中在场、在建构中发声。以这样的角度看待翻译问题是面向中国的问题，符合中国的国情，彰显中国式话语表达方式。

另一方面，中国译界学人需要具备国际视野，不断吸收外来译学的合理因子。

西方有着丰富的译论资源，其科学性、系统性、逻辑性自不待言。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依托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支撑，形成了思维缜密、理路清晰的翻译流派。我们需要挑选出符合中国翻译实际的理论范畴和命题，进行创造性的整合和建构，创造出有中国语言文化资源参与的翻译理论新形态。的确，在很多情况下，两者具备整合的基础，如果善于找到两者之契合点，也能擦出思想的火花。

出于以上的思考，本书构拟了以下四个章节：

## 第一章 重释中国译学经典话语

传统译论积累和沉淀着中国的历史经验与翻译智慧，本章选择了最具代表性的三个经典话语：“信、达、雅”“神似说”“意境”，以当代视角和思维对其予以重新阐释，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在翻译中的延伸和泛化做了解读。

在笔者看来，抓住了“经典话语”就相当于抓住了中国译学的“牛鼻子”，“进”则可以深入中国翻译活动之场域，探秘中国翻译思想之源流，领略中国译学之内涵、精神；“出”则可以知晓中国译学之地位、走向，与西方译学之关系、差异，独立于西方之特色。从纵向看，这些经典话语具有共同的哲学基础和美学源流。它们以中国传统哲学、美学为根基，以中国语言文学为依归，对翻译规律具有很强的表达力、解释力和裁量权。它们蕴含中国的文化基因，有着鲜明的文化特色，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成就了 中国译论的经典话语。

## 第二章 翻译·文化·语言

本章讨论了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三者之关系无法在翻译内部探明，我们只能将视角转向翻译之外，即与翻译相关的社会因素，包括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美学的、语言的；虽然它不是一个十分新鲜的话题：西方文化学派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介入这方面的研究，且形成一套理路清晰的话语体系，如意识形态、赞助人、操控、改写、诗学等，这些无疑是探索这一话题的利器，但本章并没有遵循这一理路，而是选取“翻译、改编和传播”“翻译和翻译体”两个议题，以

翻译为“经”，以中国语言文化为“纬”，试图编织三者相互交织的历史图卷，厘清翻译、改编对文化产生的影响、对汉语演变产生的影响。

### 第三章 汉语与翻译

中国传统文人一直诗意地栖居在自己的语言家园，理性和工具性是传统汉语的对立面。“诗性”是传统汉语的根性，它靠近心灵、充满灵性、追求意蕴、崇尚雅致、简约灵动，寥寥数笔就能留住人物事象的神韵，令人神思飞动，言有尽而意无穷。然而传统汉语在诗意的道路上越行越远，交际功能越来越弱；五四前后的翻译完全颠覆了汉语的诗性特性，其实用性得到极大的强化，严谨的句法结构能清晰构建我们缜密的逻辑思维。可惜的是，这样的语言又彻底销蚀了汉语固有的诗性。

本章选取了三个论题，包括中国文艺审美在翻译中的意义、汉语的诗性与汉译中的诗性意识以及汉语意识实践篇：历史文献回译的汉语体验。意在提倡用传统审美意识，特别是汉语的诗性意识践行翻译，以此减少翻译形式的刚性，消除凝滞和呆板，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增强汉语自觉，能在多元文化的交汇中，保持自己应有的语言个性，继承和保卫民族语言的优秀品质。

### 第四章 别求新声于异邦

前三章回归了汉语文化，走进了汉语的人文传统、翻译精神，体现了翻译研究的人文关怀和现代性思考；本章在借鉴西方话语的基础上做了一系列较为精密、理性的思考和阐发，选取西方语言学和文学研究的若干子命题，拓展翻译研究的空间和视野；主要就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的关联及对翻译的启示做了一系列的阐发。

21世纪初，西方译学研究出现了认知转向，但本章并没有对西方认知流派加以梳理和阐释，而是选择认知语言学中几个与翻译相关的话题，如图式、认知语境予以对接和拓展，使认知与翻译的探索更具操作性、可靠性。

当今译学只关注翻译的产出，即翻译成品，而忽视了翻译的生产过程，即译者的认知过程。笔者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思维运动的存在形式，翻译也不例外，研究翻译认知规律就是研究翻译的思维运动，翻译中的思维运动与其他思维运动既有同一性，又有特殊性，找出它的特殊性后，我们就可以：①透彻地了解翻译的本质，使翻译活动得到更科学、更精确、更合理的解释；②为翻译中的种种语言现象找到深刻的根源，从更深的层次上支持和否定以往的翻译观；③为译学研究提供新的视野。

第一节首先重温了图式概念，论述图式与语言的关系，得到结论：翻译是利用知识图式认知原语文本意义，形成概念，然后受到目标语言图式的干预，来表

述原文概念的过程，同时文本世界和文本语言也会分别反作用于这两个图式，认为翻译的认知过程是两种图式的两次作用过程。

第二节利用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探讨原文对译者产生的心理活动及这种活动在翻译中的表现形式，对照两类读者的心理活动以确定两种文本是否产生对等。据此，通过实例分析得出：译者的认知结构在翻译中有各种表现，具有不同认知原型的读者对包含同一文化内涵的两种语言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因此，对等不可能完全实现，翻译要参照两类读者的认知结构实现效果对等，给对等论提供更深层次的思考。

第三节在传统语境的基础上提出了“认知语境”的种种理据，揭示了三种认知个体在源发语到译语的信息转换过程中的介入流程和对信息编码的影响，阐述了认知语境在翻译中的功能，旨在说明翻译过程是通过认知来重构信息的过程。

当代隐喻学与认知语言学密切关联，因此第四节从“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生活中的语言充满着隐喻”这一视角出发，揭示英语隐喻意义的一般演算过程、演算的制约机制、演算后在汉语中的表现形式，以此来扩大隐喻翻译的研究范围，揭示隐喻翻译深层次的机理，避免以往的表象化说教；另外，即使是科技含量较高的科技文本，也会大量借用日常生活语言和其他学科词汇，这是一种隐喻现象，其实质是借用日常生活和其他学科中的概念喻指新的科学技术概念，这是第五节的主题。

“语用学”“显化”“接受美学”等命题属于西方语言学、翻译学、文学话语资源，笔者在第六、七、八节也做了切合翻译实际的探索和表达。

如在第八节，笔者认为在接受美学视域下，语言艺术化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语言“空白”和语言“陌生化”，两个维度都能产生召唤性，让读者参与审美过程。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不可避免地对原文“空白”处进行填充，但应尽量避免这种现象，特别是无谓的填充。而语言“陌生化”意识要贯穿在具有艺术向度的语言翻译之中，是因为并不是任何语言的陌生化，即采取“异化”，都能产生召唤性。

虽然以上话题大都不是西方译学中的主流话语，但是在笔者看来，只要切合中国语境，与中国的翻译实践结合有度，它们就能够改善中国译学模糊、感性的表述，提高中国译学的思辨性，让翻译研究走向科学的轨道。

探索与思考是两种不同又相互关联的智力活动，探索需要在现象背后、在旧问题的基础上，找到新的切入点，探摸并提出新的问题；而思考是对这些问题的阐发、论证、评价和判断。因此，思考是探索的延续和深化。思考需要充分调动

论证和解释的力量，需要批评的介入，但批评往往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此亦为学术之大忌。

本书名曰“翻译研究：探索与思考”，但这两种智力活动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每章树立多个小标题，即为“探索”到的问题、行将“探索”的论题；而“思考”多为中国文化、美学、语言、翻译精神的历史性呈现与现代性阐释。为了使阐释更具力道，论证是必不可少的利器和环节，因此论述就成了本书的主旋律。至于蕴含在论述之中的批评，虽犯学术之忌，但尽力避免“嬉笑怒骂，痛哉快哉”之嫌。

周红民

2017年8月



# 目 录

## 前言

第一章 重释中国译学经典话语	1
第一节 信、达、雅	3
一、“信达雅”的建构	4
二、严复的文章意识	10
三、严复的用意	13
四、“信达雅”的解构	18
五、“信达雅”解构的意义	26
第二节 神似说	27
一、独具特色的译学概念	27
二、翻译中的“神似”：分类与解读	32
三、“神似说”的他类视角	38
第三节 意境	41
一、意境的构成条件及表现形式	41
二、语内翻译、语际翻译：意境的抗译性	46
三、康德审美与意境审美	48
四、散文语言的意境化倾向	52
五、诗学观念的差异与意境呈现的限度	55
第二章 翻译·文化·语言	59
第一节 翻译、改编和传播	60
一、改编类型	61
二、影响改编传播力的因素	63
三、改编的负面性	66
四、翻译和改编的边界	68
五、《鲁滨孙漂流记》的个案考察	70

六、翻译和改编之关系	78
第二节 翻译和翻译体	79
一、五四前期的翻译语言	81
二、“欧化文”发轫的文化语境	89
三、新中国对恶性西化的反拨	97
四、20世纪80年代后期翻译界的语言观	102
五、作家看翻译文体	105
六、翻译文体之考辨——以翻译之名	106
七、翻译文体的意义	114
第三章 汉语与翻译	117
第一节 中国文艺审美在翻译中的意义	117
一、文艺审美与翻译审美	118
二、翻译审美的特殊性	120
三、信言可美，美言亦可信	122
第二节 汉语的诗性与汉译中的诗性意识	127
一、汉语的诗性	128
二、汉译中的诗性意识	132
第三节 汉语意识实践篇：历史文献回译中的汉语体验	136
一、前情概要	138
二、语言回归的手段及理据	140
三、重释回译	151
第四章 别求新声于异邦	153
第一节 翻译图式	153
一、图式理论	154
二、翻译图式假设	156
第二节 认知翻译观	159
一、认知视角下的语言及其在翻译中的表现形态	160
二、认知观照下的翻译探讨	164
三、认知能力的获得	170
第三节 认知语境与翻译	172
一、认知语境在翻译中的表现形态	174
二、认知语境在翻译中的功能	175
第四节 隐喻翻译的认知观	178

一、隐喻意义的演算过程·····	179
二、隐喻意义演算的制约机制·····	181
三、认知方式的异同与隐喻翻译的表现形式·····	184
第五节 科技英语的隐喻思维与翻译·····	190
一、科技英语的隐喻思维·····	191
二、科技隐喻的翻译·····	193
第六节 语用学原理和对等论·····	197
一、语用学和对等论的共同解释机理·····	197
二、语用前提与信息对等·····	199
三、言语行为、含义与效果对等·····	202
四、对等论再求证·····	204
第七节 翻译中的“显化”·····	205
一、“显化”研究说略·····	205
二、“显化”分类·····	208
三、汉语的“隐”：一种特殊的“显化”·····	212
第八节 语言艺术化的两个维度在翻译中的解读·····	214
一、语言“空白”与翻译“完形”的矛盾·····	215
二、语言的陌生化与异化策略的度量·····	220
参考文献·····	224
索引·····	238

## 第一章

# 重释中国译学经典话语

中华翻译传统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9世纪的周代就有传译之事的记载，其后高潮迭起，译事频仍。在历史的长河中，各路译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译事经验、译业规则、译后心得和感言，形成了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浑然一体的论说体系。罗新璋将之梳理为“案本一求信一神似一化境”，他认为“这四个概念既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渐次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①</sup>。虽然这条脉络并不一定是中国译学发展的全貌，也无法反映出中国译学的丰富内涵，但重要的是，它以“经典话语”的方式勾勒了中国译学之概貌和走向。

一提到“经典”，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文学。但是，根据刘象愚对“经典”概念由来与含义的考察，“‘经典’指那些权威的、典范的伟大著作。在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中都有‘经典’之作”<sup>②</sup>。但是，在中国的翻译思想史中，没有出现过像《国富论》《资本论》这样的鸿篇巨制，没有《文心雕龙》这种影响中国后世的文艺美学专论，因为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翻译从来就是传递佛法、引进科学、兴办实业、传播西学、醒世觉民、改造文学、对外交流的工具，从未像中国诗歌、戏剧、绘画、书法、茶艺那样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其思想大都来自僧人、传教士、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学者的心得、感悟，这些大都为经国济世之议论、文人创作之副产品、中国传统美学之衍生品。

尽管这些思想分布在中国各个不同的翻译时期，甚至散乱无序，但它们之间富有内在机理，像一盘珍珠，可以串起为完整和谐、令人瞩目、相互关联的译论体系。

对此，罗新璋先生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中做了较为完整的历史性回顾、梳理、述评。他始终对中国译论充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深感我

<sup>①</sup> 罗新璋. 2009. 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罗新璋, 陈应年. 翻译论集(修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

<sup>②</sup> 刘象愚. 2006. 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 中国比较文学, (2): 45.

国的翻译理论自有特色，在世界译坛上独树一帜，似可不必妄自菲薄”。他纵横捭阖，跨越两千多年，引经据典、言之凿凿，最终将中国的翻译理论浓缩为三个时段的理论派别：①佛经翻译的直译派、意译派和融合派；②五四前以“信达雅”为标志，五四以后推崇“信”；③1949年后以“神似”和“化境”为代表的对“神韵”的追求。<sup>①</sup>每一种标志性流派都契合了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折射出中国文人的主流美学意识，对中国人的文学理想做出了合理的回应。但是以理论的视角去考察这些观点或主张，它们没有得到理论升华，主观意识浓厚。总之，理论色彩明显弱于中国特色，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理论。

虽然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理论，但毋庸置疑的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译学形成了一套富有特色的、具有经典性质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它们以中国的哲学、美学为根基，以中国语言和文学为依归，对翻译规律具有很强的表达力、解释力和裁量权。它们蕴含中国的文化基因，有着鲜明的文化特色，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成就了中国译论的经典话语。

这些“经典话语”如同“文学经典”一样，一直处在动态的建构之中。

在文学经典研究中，“经典”被解释为“具有丰厚的人生意蕴和永恒的艺术价值，为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阅读、欣赏，体现民族审美风尚和美学精神，深具原创性的文学作品”<sup>②</sup>。这一定义一方面承认经典自身的、卓越的品质，另一方面又说明了经典是一个不断被解构、重构，且其意义可被一代代读者阅读和开发的过程，是一个与社会文化变量不断博弈、此消彼长的过程。

首先，任何文本的形式特征和主题意义在接受语境中只是一套参数，即使在这一层面，也逃不掉不断变化的规律。文本的形式，如文体，总是出于历史性偶然，它由评论家构建，服务于特定的解释目的。其结果是，对悲剧、对民歌内在属性的定义和这些属性在某一文本中的体现，随着阐释的变化而变化。这意味着，对文本中的接受与其说是由文本的内部品质决定的，倒不如说是由读者所在的社会和文化身份决定的；与文本的互动是由读者携带的不同假设、期待、兴趣和能力决定的。这种互动，虽然首先表现为一种心理和认知体验，但最终受到心理体验所在的文化规范和社会情境的制约。文化规范和社会情境提供、默认一定的阐释方法和意义，排除了其他阐释的可能性，如此强化并调节了认知体验。在这些文化规范和社会情境中，意义和价值观念相互依存、相互创

① 罗新璋. 2009. 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罗新璋, 陈应年. 翻译论集(修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5.

② 方忠. 2005. 论文学的经典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 江海学刊, (3): 191.

造、相互印证、不可分离：解读文本是为了对其进行有效的评价，具有阐释的意义，哪怕最终的评价是负面的，文本也被认为是值得阐释的。<sup>①</sup>

同样，中国的译学话语也处于动态的阐释过程中，它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始终被赋予了社会、文化和阐释者的个人因素。如同“诗言志”这句古训为后世留下了无限的可阐释空间一样，从春秋时期到近代，“诗言志”的传播过程，也是再阐释的过程。通过人们的阐释活动，“诗言志”被一次次地激活和增值，从而获得了新的生命。这也是“诗言志”经典化的一个途径。在古代文论中，还有类似“自然”“意境”和“神韵”这样的经典范畴，类似“言不尽意”“神与物游”和“文以载道”这样的经典命题，类似《毛诗序》《文心雕龙》和《人间词话》这样的经典论著，被历代学者争相阐释、论说不绝，就是因为它们有无限的可阐释空间。<sup>②</sup>

因此我们从建构和解构的视角来看待中国译论中的“经典话语”，有益于客观、正确地对待自己的翻译传统，不至于因传统译论是经验的、感悟的就否定它的合理性。

## 第一节 信、达、雅

近百年来，我国翻译标准理论以严复的“信达雅”为起点，朝着“信达切”“忠实通顺”“出神入化”和“信”四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留下了四条清晰可见、相互关联的历史轨迹。“信达切”保持“信达雅”的框架而修正其内容，因而日臻成熟和完善；“忠实通顺”将“信”“雅”融为一体，化繁古为通俗，形虽变而意犹存；“信”字说将“信达雅”归结为“信”，拓宽了其自身的发展空间；“出神入化”论从实践出发，“信”净化为“似”，并聚焦于文学翻译领域，从中抽脱出“神似”与“化境”。各派思想虽遵循的路线不同、阐发的角度不同、达到的深度和高度不同，但他们的主张却出自同一起点、为着同一目的，给人以异曲同工之妙、殊途同归之感。每一代译学家都吸取前人的思想精华，推陈出新；每一派译学家都仁者见

① Lianeri, A. & Zajko, V. 2008. Still being read after so many years, rethinking the classics through translation. In A. Lianeri & V. Zajko (Eds.), *Translation and the Classic: Identity as Change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e* (pp. 28-2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② 古风. 2006. 从“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看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6): 79.

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各派思想相互依托、相互支持、相互渗透、相互印证，形成了我国特有的“由统而分，分而似合”的翻译理论新体系。<sup>①</sup>

这段话概述了“信达雅”这一经典话语的能产特性和演绎特性，以下从建构和解构的视角充分论证“信达雅”的经典特性。

## 一、“信达雅”的建构

严复的主业不是翻译理论，在中国文化史中他以翻译取得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但最终的思想家的形象留存在世人的印象之中。后世对他在历史上的定位与其说是翻译家，倒不如说是思想家。“信达雅”在百年后受到如此的热议，这是严复万万没有想到的。

“信达雅”来自《天演论·译例言》<sup>②</sup>，由此发展为一个庞杂的论说体系纯粹是因为后世学者的解构和建构。严格地说，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严复翻译《天演论》的心得、一篇启示录。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本身就是一篇“译者前言”之类的序文，如同“《原富》译事例言”“《群己权界论》译凡例”“《名学浅说》译者自叙”这些序言一样，它只具有当下性、一次性、针对性，即它是针对翻译《天演论》而发的感言，对其他翻译不具有普适性、规约性和永恒性。如果我们逐段阐释《天演论·译例言》，其“当下性”可见一斑。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慎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就第一段来看，除了“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言明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外，剩下的部分指出了当下译作粗制滥造的原因，宣示了自己翻译《天演论》的“达旨”方法和“达旨”

① 刘期家. 2000. 论“信达雅”的历史发展轨迹.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 101.

② 沈苏儒. 1998. 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38-41.

目的，这些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即是说，这些都是严复翻译此书的心得体会，并告诫后来者，这实在不是做翻译工作的正当方法。

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在第二段里，严复阐述了西文的句法特征：“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它实际上指解释概念时英语所使用的定语从句、同位语从句之类的句式，与汉语句式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严复将之类比为汉语经典的旁注、引证。在文言时代，严复无法突破语言的拘囿，只能用他所能理解的“达”的方法来绕开原文的长句，采用“译意”不“译句”来取得“达”的效果；“全文神理，融会于心”恰好体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审美心理，其独特的、与西方民族迥然有别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即以直觉的、由表及里的方式来观察、体悟，需要投入整个身心及灵魂，与世界保持完美协调的状态，才能“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sup>①</sup>，才能“下笔抒词，自善互备”；严复在此段讲的最后一个问题，“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既是“词”的翻译问题，又是“文化”缺位的问题。词既是意义的载体，又是文化的载体，构成了“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的和谐状态。当一个民族的物质和思想观念在另一文化缺位时，就会造成能指的缺位，没有恰当的词汇来框定这一新的意义。严复在此采取的办法是在前后多加些引证、衬托，在今天看来，也算是那种“解释性”（paraphrasing）的翻译了。最后，严复把这一切归结为“达”，但“为达即所以为信也”这一观点就有些牵强了，在今天看来，“信”除了忠实于“内容”外，还得忠实于形式和风格，而“达”只强调内容的通达易懂，如果按照现代翻译观审视，译文通达易懂是无法信于形式和风格的。因此，这一观点是严复为翻译《天演论》专门设置的。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

① 傅敏. 2006. 傅雷文集.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15.



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又原书论说，多本名数格致及一切畴人之学，倘于之数者向未问津，虽作者同国之人，言语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译也耶！

此段的主旨可分为两个部分：①严复从“经史子集”中阐发的一种翻译观；②阐明严复在翻译论著类书籍时，秉持此种观点的理由。

“修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在古文献中，“修辞”最早见于孔子。《周易》记载，孔子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后人对“修辞”又有多种解释。《说文解字》说：“修，饰也。”“辞，讼也。”唐代人孔颖达解释说：“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也就是说，“修”就是“修理”，“辞”就是“文教”，“修辞”就是“修理文教”的意思，即提高自身的言谈举止等外在素养水平，<sup>①</sup>很显然，“修辞”专指为人的修养，是道德层面上的概念，这与现代人对“修辞”的界定不在一个层面上。严复的“修辞立诚”指对原文忠实；借“辞达而已”指清楚明白表达原文的意思即可。“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更是封建文人的“文章观”，严复希望以自己的译著影响后人，流芳百世，是封建道统观念在翻译中的渗透和泛化。而“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是对前面文章观念的再度强化，以封建文人的文章标准来判断译文的“达”和“雅”，它与今天的语言观格格不入。“又原书论说，多本名数格致及一切畴人之学，倘于之数者向未问津，虽作者同国之人，言语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译也耶！”从表面上看这一观点颇有几分道理，但这不是秉持这种翻译观的理由。西学东渐之初，国人对新知的接受能力差，需要更加通俗的语言加以晓谕，而严复反其道而行之，却“用汉以前字法、句法”，他遵循和维护的显然是封建士大夫的文章观念。

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顾其事有甚难者！即如此书上卷导言十余篇，乃因正论理深，先敷浅说，仆始翻“卮言”，而钱塘夏穗卿曾佑病其滥恶，谓内典原有此种，可名“悬谈”。及桐城吴文挚甫汝

① 陈汝东. 2004. 当代汉语修辞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4-5.